

引子 跨世纪的冲刺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中国经济并没有一下子就进入一个许多人幻想的天地。于是，有国人叹息：市场经济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洋人预言：中国不搞改革是等死，搞改革是找死……

中国经济是起是落？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市场经济不是吃人的狼，也不是温顺的羊，而是一匹需要驯服的野马。1997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和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共和国政府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中国不走回头路！

一、中国人松了一口气：1992年 不是误会，1998年没有倒退

历史的车轮隆隆驶向21世纪的终点站。有人说，每到世纪之末，社会便会出现大的震荡，历史便要发生新的转折。

当我们翻开1997年的第一页日历，我们曾有过许多困惑；当我们翻开1998年的第一页日历，我们曾有过许多担忧；而当我们翻开1999年的第一页日历，我们虽然没有完全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却感到踏实。中国的老百姓不再只关心奖金的多少，物价的涨落，而开始与中国的高层领导一起关注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改革的进程。

我们面临着世纪末的冲刺，面临着新旧经济体制的转换，面临着 21 世纪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人没有理由不躁动不安，没有理由不情绪激动。

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激动人心的 1992 年。就在中国的改革遇到阻力、经济面临危机的时候，一位杰出的共和国老人、当时已 88 岁高龄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再沉默了。这位信奉“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干家从时代的高度从客观的历史规律出发，果断地敲响了垄断中国 43 年的计划经济的丧钟。

世界震惊了！

中国沸腾了！

从南国到北疆，从首都到乡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10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古老大地上，再次激荡起改革开放的长波阔浪。各行各业、各省各市的干部群众，都在按市场经济思考问题，按市场经济转换脑筋。市场经济，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大潮。

1992 年 10 月 12 日，中共十四大正式确定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犹如一支强心剂，给中国经济注入了生机，注入了活力，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新的经济高速增长浪潮，1992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 1989、1990 年的 4%，1991 年的 7.7% 一跃达到 14.2%，超过了 1988 年 11.2% 的增长速度，当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接近 24000 亿元。

但是，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熏陶下的中国人，对市场经济太缺乏了解。许多人（包括相当级别的地方领导和企业负责人）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建市场、办公司、搞开发，加上致富心切，使许多地方

的经济改革成为“没有航标的航船”乱撞者有之 瞎碰者有之 违法违规者也有之。于是，就在各级政府轰轰烈烈争投资、立项目、搞开发之际，就在中国老百姓热热闹闹买股票、炒房地产、办公司之际 中国经济突然陷入了通货膨胀、市场疲软、企业亏损、财政赤字的泥沼。虽然后来中央迅速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控制住了过热的经济，但市场疲软继续加剧，企业亏损更加严重，工人下岗逐渐增多……

中国的经济运行又一次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改革开放 20 年以来，我国经济一共出现过 4 次“过热——紧缩——放开——过热”的循环。1984 年，我国在“洋冒进”的影响下，一年投放了 262 亿货币 结果当年就经济过热 物价猛涨 第二年被迫进行了全面紧缩。1986 年初，工业生产掉入谷底，全国一片恐慌 在发展和放开的双重压力下 信贷规模再次膨胀 到 1987 年秋季，又不得不实行紧缩信贷、紧缩财政的“双紧”方针。1988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滑坡，货币投放的闸门又一次打开，结果酿成七八月份的全国性抢购风潮，引发以后两年多的治理整顿。1992 年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下的经济发展，怎么也会陷入这个“过热——紧缩——疲软”的“怪圈”呢？

要发展 就要加快速度 速度快了 经济又过热 过热了就要调整，调整又降低了速度。中国人困惑了：中国，你难道真的是一头跑不动的老牛，一辆跑不快的破车？

有人把黑锅扣在了市场经济的头上，认为市场经济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有些居心叵测的洋人则不无幸灾乐祸地说：中国人驾驭不了市场经济。他们甚至断言：中国不搞改革是等死，搞改革是找死！似乎中华民族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中国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维持原有格局，用行政手段平衡经济的冷热循环；要么继续深化改革，用市场经济调控经济的发展。

进也难 退也难 中国面临选择！

但是后退没有出路，没有哪个中国人愿意倒退到那个捏着肉票买肉，拿着布票扯布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哪个中国人愿意再过那种吃饭靠分配，穿衣清一色的贫穷生活。带领中国人推翻了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这次注定要带领中国人奔向富裕的新生活。

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不走回头路！这是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的共同心声。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本世纪末最后一次党代会，也是本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党代会。因为它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择了改革开放、1992年的十四大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这次大会确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十五大一锤定音：中国人不走回头路！

中国人松了一口气，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人松了一口气，全世界关心与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人松了一口气：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不变、立场不变、方向不变！

国内外都一致把十五大列为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的十四大并列的第三次选择、第三次思想解放。确实，这是在中国经济处于低迷状态、许多人陷入困惑彷徨境地时作出的正确选择，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受到挑战时作出的果断决定。许多人都不会忘记从1995年开始，社会上就陆续出现所谓的“反思”思潮。“反思”的中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姓“公”与姓“私”的问题。一些人提出我们搞市场经济还要不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我国现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逐日增多，这会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1992年掀起的新一轮改革大潮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如果认真剖析这种思潮，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是1992年初姓“社”与姓“资”问题的翻版。十五大一语中的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

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只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如果说十五大是给了全世界一颗定心丸的话，1998年3月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和3月5日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则是给全中国人的一支强心剂。在2944名人民代表出席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前总理李鹏说：回首五年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对外开放继续扩大，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九届全国人大再一次肯定了我们改革开放的选择是对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选择是对的。

江泽民主席坚定地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要奋斗要发展，就会有困难有风险。但是，任何困难和风险都无法阻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这个雄心壮志不仅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必将胜利地达到现代化的光辉彼岸。”

1998年3月19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推出新一届政府“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纲领。面对600多名中外记者，朱总理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袒露自己的决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范围更广、力度更大、步伐更快的新一轮改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国有企业 3 年扭亏进入倒计时；

金融体制改革全面铺开；

政府机构改革正式启动，国务院率先行动，精简分流人员 50%；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紧锣密鼓；

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初见成效；

住房制度改革登台亮相，实行了 40 多年的福利分房宣告结束；

医疗制度改革浮出水面，公费医疗即将寿终正寝；

财政税收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费改税着手实施……

美国《侨报》发表题为《中国奏响跨世纪进行曲》的社论说继中共十五大选举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之后组成的国家权力机关领导班子，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全面实现中共十五大确定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澳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杨汉勇先生认为，在新领导班子的领导下，中国将会更深入地进行改革开放，为中国今后的繁荣和稳定提供有力的保证。

如果说 1997 年是我国内政外交极其辉煌的一年，1998 年则是我 国政治经济改革具有突破性质的一年。历史注定把太多的辉煌定格在 1997 年，也注定了把更艰巨的使命留给了 1998 年。市场经济不是吃人的狼，也不是温顺的羊，而是一匹需要驯服的野马。改革遇到的困难，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才能克服，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新问题，则也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解决。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二、不搞改革是等死 但搞改革不是找死

当许多人把羡慕的目光投向西方发达国家时，他们并没有想到，中国，并不生来就是穷国。相反，直到 17 世纪中叶，中国还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文明古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时，光景德镇一个镇的工业产值就大概相当于工业革命前夕英国整个的外贸出口总额。这足以使我们夜郎自大了好多年。到 1800 年中国制造业产业在世界上所占份额达 1/3。到 1860 年，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但中国当时仍然还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产品生产大国，工业产品占到全世界的 19.7% 仅仅稍逊于英伦岛上那个号称“日不落国”的英国 19.9% 的世界产品占有比率，在全球位居第二。到 20 世纪初，中国还生产了全世界近 1/3 的产品，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1840 年英国的“远征军”驾着 20 艘炮艇轰开了清王朝闭锁的国门，从此，中国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战乱之中。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内军阀的混战，使中国丧失了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机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以后的近 30 年中，正是国际形势比较稳定的时期，许多国家利用战后大力发展经济，一跃成为经济强国，中国却偏偏卷入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之中。政治大“跃进”经济却大倒退。

根据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看到，1955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 4.7% 而日本只占 2.4% 就是说按绝对值计算中国要比日本高出一倍。而到 1980 年，中国却下降到了 2.5% 日本却占到了 9.5%。25 年过去了，中国反而只有日本的 1/4。在这期间苏联和东欧的比重由 8.6% 上升到了 12.4% 全部发展中国家从 20.7% 增加到了 21.5% 西欧从 26.6% 增加到了 27.9% 中

国反而减少了一半。

我们曾想发展经济，但我们却不是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而是用政治手段，用行政命令，用计划经济体制来干预甚至扭曲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极端排斥市场经济，堵塞商品流通，使中国的经济，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就处于竞争的劣势。义和团的符咒不能抵御外国的洋枪洋炮，我们用双腿也无法赶上人家的汽车轮子。196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中国 4600 亿美元 到 1985 年，竟超出了 36800 亿美元。我国人口占世界的 21% 国民生产总值却只占 2.1% 而美国人口占世界的 4.8% ，国民生产总值却占全世界的 26.6%。1980 年，中国大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90 美元，在世界上 128 个国家中排名第 100 位 而新加坡是 4430 美元，香港 4240 美元 韩国 1520 美元。

如果嫌这些数据还不够充分的话，我们不妨再看看许多中国人相当熟悉的我们自己的情况：到 1978 年，中国年收入在 100 元以下的农民竟占了总人口的 35.37% 有 231 个县人均年收入还低于 50 元，长期靠调拨大批粮款还难以维持下去。绝大部分农村，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31.5% 的农户是超支户 平均每户超支 139 元。许多地方的农民劳动一天，竟只值 8 分钱，真正的买盐不咸买椒不辣。从 1956 年至 1978 年的 22 年中，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仅 2.5% ，农民从集体分配的年平均收入，1957 年为 40.5 元 到 1977 年还只有 65.4 元，每年仅增加了 1.2 元。每个农民的商品购买力，1957 年是 36.94 元，1977 年仍只有 58.57 元 刚够称点盐 打点煤油。

曾由于为人民说实话而几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实际上从 1958 年开始到 1978 年 20 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都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他尖锐地强调：“这种状况，不改革行吗？！”

历史，把中国推向了改革之路。以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的发端，到 1998 年正好是 20 年。这是风风雨雨的 20 年，是坎坎坷坷的 20 年，也是翻天覆地的 20 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国民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5634 亿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79553 亿元 增长了 14.12 倍 外汇储备由 1978 年的 16 亿美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1450 亿美元，增长了 90.6 倍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 211 亿元增加到 1998 年末的 5.3 万亿元 增长了 251 倍。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家庭 无论是吃的、穿的 还是住的、用的，哪一项不体现改革的成就？不搞改革，数以亿计的农民将还在忍受饥饿的煎熬；不搞改革，成千上万的城镇居民将还在为称半斤肉、买两片豆腐排队；不搞改革，商店里不会有如此琳琅满目的商品，家庭里不会有如此丰富多彩的现代电器……一句话，没有改革，就没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当然，我们也还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但这不是改革的过错，恰恰正是改革不深入不完善的结果。如果因此就否定改革，否定市场经济，则不仅是错误的，也是荒唐的。

事实证明，中国不搞改革是等死，但搞改革却不是找死，而是找到了出路，找到了活路，找到了中国的富强之路！

三、中国走向成熟

早在 1993 年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1993 年，对于襁褓中的中国市场经济是极为重要的一年，面对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面对新旧观念的冲突和碰撞，多少人都在为它捏把汗：中国的市场经济，你能顺利地度过你的新生期吗？你能经受住历史对你的考验吗？……”

这篇文章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国人的心态。

6年过去了，虽然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困难，遭受了许多挫折，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并没有让关注它的人们失望。1993年至199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9%，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8.7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4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也比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印度尼西亚高出2.2—3.7个百分点。1998年，全球金融动荡与经济滑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定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仅为2%，而面临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的中国，却实现了7.8%的经济增长率。199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10位，1995年便跃居世界第7位，超过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从1993年至1997年我国谷物、棉花、油菜籽、肉类、煤、布、水泥和电视机产量继续保持世界首位；发电量从第4位上升到第2位，化肥产量保持第2位，糖产量居第3位或第4位；原油产量保持第5位，特别是1996年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从世界第2位跃居首位。在商品贸易市场、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旅游市场，我国均占有重要地位。1997年我国以3250亿美元的进出口总值进入全球贸易的第10位；外汇储备仅次于美国居第2位。人民生活质量更是逐步得到改善。6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7.6%，居世界前列。1996年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93.5台，农村家庭每百户拥有电视机88台，均高于世界水平。市场经济在它的摇篮期就向世人显示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

但是，改革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越往前走，困难越多，阻力越大。

我们要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但又怕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

我们要搞活企业，但企业还被行政管理的框框圈着。

我们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国际市场，但又怕冲击了自己的民族工业。

我们要建立统一的商品流通体制，但又难以突破条条块块的封锁。

我们要发展经济，但企业效益连年下降。国有企业 1/3 明亏，1/3 潜亏 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连年出现赤字 市场一蹶不振 光仓库里就积压了 3 万亿元的产品……

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进，困难重重；退 20 年的改革付之东流……

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时间和余地了。裹足不前或半途停顿，都会使刚建立的经济新格局土崩瓦解。党的十五大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动员令和进军令。新一届共和国政府和近 3000 名人大代表为中国描绘了一幅跨世纪的改革蓝图——以机构改革为基础，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以金融改革为保障，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初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最能体现当前改革特点的是，中国一改过去用政治口号指挥生产、用政治热情推动经济的做法，而开始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立 1998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 8%，当时许多人不以为然。在过去 5 年里 尽管宏观调控力度很大，物价上涨幅度百分点从两位数回落到 0.8%，年均增长速度仍高达 11%，即使在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 1952 年至 1972 年里，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仍有 6.4%。但是，正如山东代表、济南铁路局局长彭开宙说的：“8%的目标实事求是 确定 8%而不是更高的速度，这本身就说明中央领导集体成熟理智 驾驭全局的能力很强。”也许是我们太穷了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太落后了，因此我们总想发展快一点。但是，正像一口不能吃成胖子一样，经济发展有经济发展的规律。违背经济规律而求快，其结果必然是扭曲与破坏经济发展。1958 年的大跃进、1984 年的“洋冒进”、1988 年的物价闯关以及 1992 年的开发热，无一不

让我们品尝到了违背经济规律的苦果。这次人大会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与经济格局，确定 8% 为我们的发展速度，既维持了我们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又保证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日本《东京新闻》据此评论中国成熟了！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新一届政府的头脑清醒与坦率务实。1999 年 3 月 5 日，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 1998 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7.8% 说明年初的计划是客观的，是切合实际的。如果我们把目标定得过高，势必造成各地各部门为了高指标而进行一些不切实际的炒作行为，引发泡沫经济。

更能体现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中走向成熟的是，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朱镕基一改过去对经济增长定“目标”的做法而以“预期”的方式表达对经济增长的估计与预测，确定 1999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 7% 左右”。这不是单纯的文字表述方式的异动，而是体现一种经济管理模式的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里我们无不是围着计划、目标、指标打转转，结果导致了許多不切实际的行为。而市场经济，则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作。朱总理在报告中明确地说：“这个增长速度是指导性的，是就全国来说的，各地情况不同，有的增长速度可能高一点，有的也可能低一点。”日本《东京新闻》为此评论说“中国谋求向不受‘目标’束缚的灵活的经济运营转换。这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中国已从‘重视指标’的计划经济中摆脱出来。

头脑清醒，坦率务实，讲究效率，这是我们进行新一轮改革所必须坚持的原则。

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我们搞计划经济搞了几十年，现在要将市场经济的枝芽嫁接到社会主义这棵大树上，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我们不怕困难，但我们必须正视困难。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新一轮改革的成功启动，标志着中国驾驭市场经

济的能力越来越强，也体现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走出了迷途，走出了混沌，走向了成熟！

中国开始了本世纪的最后冲刺，而 1999 年 则责无旁贷地成为世纪攻坚的关键一年！

第一章 大潮再起

历史注定了把许多的辉煌留在 1997 年 香港回归、黄河小浪底大坝合龙、长江三峡截流.....

历史注定了把一次道路的选择与思想的解放留在 1998 年 我们是前进还是倒退？

历史也注定了把改革攻坚的任务留在 1999 年 五项改革全面启动，国企扭亏进入关键时刻.....

世纪末，中国人面临着一场艰巨的挑战！

美国的《时代》周刊曾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新总理朱镕基像一只飞向太阳的大鸟，但翅膀被烤焦了。

在美国人看来，太阳意味着光明，值得追求，但太阳的热度足以烤焦朝向它飞来的任何追求者。

1998 年 11 月 16 日，1990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教授来华时和朱镕基进行了长谈，共同探讨了亚洲和世界的经济走向。朱镕基不无自豪地请米勒教授转告《时代周刊》：“我的翅膀还在。”

是的，总理的翅膀还在，中国的翅膀也还在！

人们不会忘记 进入 90 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刻 中国陷入了市场疲软、商品积压、效益滑坡、企业亏

损、工人下岗的困境。一些人不是帮助把中国的改革列车向前推一把 而是品头评足 或者“反思”或者“探讨”或者“分析”认为中国改革的列车偏离了方向，正在向私有制靠拢。为此，有的认为，市场经济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改革应该是在不触动所有制前提下的缝缝补补 小打小闹，有的则提出“，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目前必须反和平演变……

中国的改革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是进是退，是左是右，困扰着 12 多亿中国人。进 我们困难重重 退 则中国 20 年的改革努力付之东流。

但是，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惟一的选择是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 冲破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用朱镕基的话说 就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 我都将一往无前 义无反顾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没有这样大的决心，我们的改革就无法向纵深挺进；没有这样大的决心，我们的经济就难以摆脱困境！

1997 年 9 月 12 日，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五大召开。此次大会针对姓“公”姓“私”的“反思”，首次把“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提出来。与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冲破姓“社”姓“资”的禁区而走上市场经济道路有异曲同工之妙，十五大带领中国人民终于冲出了姓“公”姓“私”的怪圈 而开始了一场影响更深、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改革。

以 1998 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为标志，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启动了。1998 年 3 月 19 日，朱镕基作为新任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推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纲领。从此，中国的各项改革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由国务院带头，多少年来一直不敢正面接触的政府机构改革全面铺开了；

金融改革向纵深进军，人民币坚挺如故。中央人民银行撤销

省级分行，成立跨行政区的 9 大直属分行，以摆脱地方行政干预；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为 1998 年的重头戏，朱镕基亲自过问，在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召开了 4 次全国性的专题会议，出台了两个条例法规，并由国务院发布了十余个相关文件；

实行了 40 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宣告结束；

牵涉 2.3 亿人的公费医疗制度将进行重大改革……

在 20 世纪即将降下帷幕，21 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国，不失时机地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大潮！

春播秋收，我们的改革已初显生机，初见成效。

1999 年 3 月 5 日上午，朱镕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屡屡被与会代表们的掌声打断。据《光明日报》社的记者统计在 1 小时 40 分钟的报告中，大会堂内掌声先后响起 18 次之多。

掌声在朱总理阐述 1998 年经济发展成就、宣布 1998 年经济发展目标基本实现时响起；在宣布国内生产总值实现 7.8% 来之不易时响起；在宣布中国顶住了亚洲金融危机、保持了人民币不贬值时响起；在宣布伟大的抗洪精神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奋进的强大动力时响起……

这是中国在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后取得的辉煌成绩，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了全球导致全世界经济动荡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功，中国人鼓掌，全世界也无不注目。摩根士丹利添惠总经济师认为中国成功处理了 3 大挑战：能否保持币值稳定、能否保持改革速度、能否保持经济增长。令人振奋的是，人民币没有贬值、改革步伐没有放慢、经济增长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英国《金融时报》载文说：在亚洲其他国家迅速倒退的时候，中国的进步尤其惊人。中国没有被亚洲危机拖倒，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也不会被危机拖倒。中国取得的成就应当得到赞扬。

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大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汹涌向前！

一、第三次思想解放

邓公给市场经济定“姓”

“政治”打个喷嚏；“经济”也要患感冒。这是中国独有的“国情”。

1978年粉碎“四人帮”两年后的中国，“左”的阴霾却没有随之散掉。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束缚下，我们还在以抓阶级斗争为纲，还在反修正主义，还在坚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经济上则又来了一次“洋跃进”要搞十来个大庆，拿下二十几个鞍钢，要求到本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

其结果不言而喻。据学者研究，1978年的农业生产率居然只有1952年的77.6%。“两个凡是”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

1978年6月12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隆重推出，立刻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讨论，终于推翻了两个“凡是”，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用实践来检验，一切以事实来证明，这本来属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灵魂，但在极左的思潮统治下，中国人却一直只能惟上，惟书。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成为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次大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终于结束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

但是，我们没有料到，就在许多人尽情地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有人却又捡起了“凡是派”的旧理论，改头换面，弄出一个